



北京与莫斯科：



结盟·对抗·合作

李华 / 著



人民出版社

北京与莫斯科： 结盟·对抗·合作

李 华 /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侯春
装帧设计:徐晖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李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01 - 006461 - 1

I. 北… II. 李… III. ①中苏关系-研究 ②中俄关系-研究

IV. D822.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1578 号

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

BEIJING YU MOSIKE JIEMENG DUKANG HEZUO

李 华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7.75

字数:440 千字 印数:0,001 - 4,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6461 - 1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1949 年至 2007 年,北京与莫斯科从结盟走向对抗,从对抗走向和解,再从和解走向战略协作伙伴的关系演变,是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人们颇感兴趣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

有鉴于此,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在认真研读那些丰富而又庞杂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视点,撰写出一部时间跨度大,内涵丰富,图文并茂,又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中苏、中俄关系著作来。可以说,责任感是驱使我长期以来对该课题保持学术研究热情的内在动力。

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一书,就是笔者以“实证、探真、拓新”为初衷完成的一部新著。为撰写本书,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即开始有的放矢地收罗相关图书资料。在长期学习研究的基础上,我于 2003 年写出了本书的初稿。最近 4 年,我又三易其稿。从当初构思本书到最后杀青,真可谓“十年磨一书”。

本书对近 60 年中苏、中俄关系的发展及其演变情况,分为 17 章进行讨论。每章均按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体例撰写。在评价相关事件和人物时,注重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结论。

应当承认,拙著作为目前国内一部将中苏、中俄关系历史与现状贯通研究的学术专著,对有些问题的解读,还只是一家之言。其能否成立,有待大家评判与时间印证。但笔者的心愿是:一方面,

通过对 400 余种中外文献的认真梳理与钻研,力图全景式地再现 1949—2007 年中苏、中俄关系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过程,从而使广大读者对此问题能有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系统的认识,并逼近于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回顾、总结北京与莫斯科交往半个多世纪的是非恩怨,更希望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中国与俄罗斯两大邻邦,共同构建面向 21 世纪的新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历史的启迪与决策参照。如果拙著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将中苏、中俄关系史研究推向前进、引向深入,又能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现实尽绵薄之力,那么,我将备感欣慰。但愿这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能够达到一致。

严谨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在继承前人、借鉴他人已有劳动成果之后的再创造。因此,书稿付梓之际,我首先要衷心地鸣谢拙著中引注过的所有论著的作者。如果没有他们此前业已发表的相关书籍与论文的“滋养”,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或者说,写不到现在这个程度。事实上,本书在努力反映作者个人学习研究心得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介绍海内外学术界同仁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在各章页下注及书末参考文献中,详尽地标明了所有引用观点及参考资料的来源。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化要求我做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被引用著述作者的敬重。

本书写作,得益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兼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季志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徐葵研究员,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学术文库总裁沈志华研究员等中苏、中俄关系权威专家提供的资料或学术指导。特别应感谢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同行专家们。近三年里,他们不辞辛劳,在百忙之中逐字逐句地反复审读拙稿,订正了原稿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并且提出了许多非常中肯和到位的修改意见。专家们高度负责的精神令我感动,并深获教益。在本书定稿过程中,我已经完全采纳

了他们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相信经过反复修改，肯定能够使本书少一些纰漏与遗憾。外交部办公厅参赞丁孝文博士也为拙著操心出力不少。原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前任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高寿先生在得知我写作本书之后，特拨冗来信给予热情鼓励，并且提供了我获取一部分重要资料信息的官方网站地址。

我的爱人吉定教授负籍上海攻读博士学位之余，为我从沪上各大图书馆借阅、复印不少资料，并对书稿提出过有益的建议。儿子李洁心在操作电脑方面给过我许多积极帮助。同窗姜德琪教授也曾多次为我购置并赠阅过一些必读图书。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侯春先生在本书章节设计以及写作过程中不断给予关心、指导，并对书稿进行了十分认真的审阅和极富责任心的编校。本人原工作单位江苏南通大学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大部分资助。2005年年初，笔者应聘到浙江嘉兴学院工作后不久，拙书稿主体部分又被评定为当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课题编号：Z05ZF07），并获立项资助。我对以上同仁、朋友、家人、领导所给予的不同方式的帮助支持，一并致以衷心谢忱！正因为有他们的共同参与，才使本书不断增色，并得以最终面世。当然，仍有可能留在拙著中的错误或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责。若能得到读者批评指正，则幸甚。是为序。

作 者

2007年8月20日序于浙江嘉兴南湖之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1949—1953 年：中苏同盟的形成	(1)
第一节 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莫斯科	(1)
第二节 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	(17)
第三节 中苏友谊中的龃龉和矛盾	(29)
第二章 1954—1955 年：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37)
第一节 1954 年赫鲁晓夫首次访问北京	(37)
第二节 第一次台海危机与中苏利益冲突	(50)
第三节 苏联人在中苏同盟中的领导者心态	(54)
第三章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与中苏裂痕产生	(60)
第一节 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	(60)
第二节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	(65)
第三节 米高扬出席中共八大	(73)
第四节 波匈事件与中苏两党反应	(76)
第四章 1957 年：中苏两国频繁的高层交往	(88)
第一节 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东欧	(88)
第二节 北京隆重接待伏罗希洛夫元帅	(94)
第三节 米高扬杭州通报“倒赫事件”	(99)
第四节 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	(103)
第五节 毛泽东第二次莫斯科之行	(106)

目

录

第五章 1958年：中苏之间未能实现的军事合作	(118)
第一节 苏联请求建立长波电台问题	(121)
第二节 苏联提议建立联合舰队问题	(125)
第三节 赫鲁晓夫第二次访问北京	(129)
第四节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苏联的反应	(134)
第五节 美制“响尾蛇”导弹风波及其影响	(141)
第六章 1959年：中苏关系继续恶化	(144)
第一节 赫鲁晓夫影射攻击中国内政	(144)
第二节 苏联撕毁中苏两国核技术协定	(149)
第三节 彭德怀事件的“苏联因素”	(151)
第四节 中印边界冲突与赫鲁晓夫介入	(155)
第七章 1960年：“压不了也压不倒”的中国共产党	(176)
第一节 赫鲁晓夫把毛泽东比喻为“旧套鞋”	(178)
第二节 中共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	(179)
第三节 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设“陷阱”	(182)
第四节 苏联专家成为中苏政治斗争牺牲品	(186)
第五节 81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与《莫斯科声明》	(192)
第八章 1961—1964年的中苏关系：缓和与逆转	(202)
第一节 1961年中苏关系改善昙花一现	(202)
第二节 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与中苏争执再起	(208)
第三节 7万中国新疆边民逃亡苏联事件	(212)
第四节 苏美合谋阻挠中国成为核国家	(219)
第五节 没有胜利者的中苏大论战	(222)
第九章 1964—1965年：中苏关系改善失去机会	(234)
第一节 苏联国防部部长提出“推翻毛泽东”	(234)
第二节 中共评价赫鲁晓夫下台是件大好事	(243)
第三节 毛泽东发誓要与苏共公开论战一万年	(245)

第四节	中共拒绝参加 19 国莫斯科会晤	(250)
第五节	中国留苏学生反美游行示威及中苏交涉	(254)
第十章	1966—1968 年：“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中苏关系	(260)
第一节	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及其原因	(260)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前期中苏交往中的过火行为	(262)
第三节	中国对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	(274)
第十一章	1969 年的中苏边界战争：缘起与结果	(281)
第一节	中苏边界领土纠纷溯源	(281)
第二节	珍宝岛血战：过程、原因及影响	(286)
第三节	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	(296)
第十二章	1970—1976 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苏关系	(308)
第一节	中苏马拉松式的边界问题谈判	(308)
第二节	影响中苏边界谈判进展的几个因素	(314)
第三节	中苏军队对峙：人数、部署及核武器	(323)
第十三章	1977—1979 年：后毛泽东时代的中苏关系	(329)
第一节	中国新领导人对苏联“示好”的反应	(329)
第二节	中国正式中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339)
第三节	苏联入侵阿富汗，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342)
第十四章	1980—1990 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345)
第一节	中国对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的反应	(345)
第二节	中苏通过多渠道向关系正常化过渡	(348)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对华外交新思维及其影响	(354)
第四节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	(362)
第五节	苏联官方对 1989 年中国政治风波的态度	(367)
第六节	中苏国家关系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	(369)
第十五章	1991—1992 年：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过渡	(373)
第一节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莫斯科	(373)

第二节	苏联“八一九”事件与中国政府的立场	(379)
第三节	中国政府对俄罗斯联邦的外交承认	(381)
第四节	中俄双边关系的逐步升温	(384)
第五节	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与中俄“互视为友好国家”	(390)
第十六章 1993—1999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395)
第一节	江泽民与叶利钦频繁互访及其成果	(395)
第二节	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制度启动	(432)
第三节	中俄贸易发展的条件、进程及制约因素	(443)
第四节	中俄两国科技、文教、军事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458)
第十七章 2000—2007年：新世纪之初中俄关系继续发展		(470)
第一节	高层接触“具有十分活跃的性质”	(470)
第二节	两国经贸合作规模与领域逐步扩大	(486)
第三节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	(496)
第四节	中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希望	(503)
附录一：主要参考文献		(523)
附录二：图片来源说明		(554)

第一章

1949—1953年：中苏同盟的形成

第一节 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莫斯科

众所周知，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即10月2日，中苏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使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①

中苏建交后，双方立即派出外交代表。中国政府委任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苏联政府则委任齐



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前排右六）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后合影。

^①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國書

固不僅有利於

責我兩國之親密合作，抑且有利於世界和平與安全。為此，本政府特任命王稼祥為駐

貴國特命全權大使，並令其向

貴主席親呈國書，希予足見，給以信賴。

頤頤

責主席政躬康泰，

責國國家繁榮，人民興旺。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

國主席史維爾尼克先生聞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首先頒典，我

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中國人民對此極感欣慰。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熱忱歡迎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友好邦交，並堅信此種邦交的建立與鞏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外交部部長 周恩來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

北京

國字第壹號

П Р Д З И Ж М У І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ГЛАВНЫЙ ОФИЦИЕЛ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СЕХ СОВЕТ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Всесоюзного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абочих, членов и крестьян Совет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первом упомянутом, что друже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итаем открыты широким лицам в высокородных званиях — э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ыражение слоя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крестьян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 имеющих общ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мир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Юрий Гагар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Юрий Гагар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Юрий Гагарин.

Юрий Гагар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Юрий Гагар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Юрий Гагарин.

Запечатано в Академии Кит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за № 2778

1949年10月中苏两国相互递交的国书文本。

赫斯斯基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各自先行开馆工作。接着，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政府则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0月10日，苏联大使罗申抵达北京，中国政府给予特殊礼遇，首都群众3000多人到车站迎接。周恩来总理致祝词说：“从此，中苏两国邦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10月31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抵达莫斯科，同样受到苏联超过一般礼宾惯例的热情欢迎。

中苏建交，对于击破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阴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提出，新中国成立加以落实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果。^①当然，这一政策的推行，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毛泽东：《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1949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有其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首先，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民族独立，恢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新中国领导人认为，要建立起新型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的屈辱外交传统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

其次，冷战把世界分裂成互相隔绝的两个部分，新中国在亚洲冷战中首当其冲，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怎样的对外政策才有利于新政权建立与巩固。基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虑，毛泽东选择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可谓顺理成章。

第三，宣布“一边倒”不仅有外交方面的需要，也有内政方面的需要。其对内含义是，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允许走“第三条道路”。

最后，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外交方面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包括：得到国际承认，争取经济援助，保障新生国家安全等等。在选择了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之后，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争取苏联的帮助。^①

当然，中苏建交还只是实行“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第一步。为大力推进中苏关系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即着手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的准备。毛泽东这次出访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② 因为该条约是雅

^①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总第133期），第12页。

^②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7页；颜声毅等编著：《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477页。

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则是苏美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条约。^①因此，两国应商订新约取代旧的中苏条约，以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关系的新形势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和进行参观访问。

然而，毛泽东对于莫斯科之行能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没有任何把握。出发前，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及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感是正确的。^②

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6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和汪东兴。苏方由罗申大使陪同。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前来迎接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等。毛泽东在车站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他说：“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

^① 田居俭：《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斗争——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6—7页。

^② 沈志华、[俄]谢·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苏人民的友谊。”^①书面讲话虽是礼节性的，但它反映了毛泽东的访苏意向。因当日天气寒冷，故毛泽东匆匆检阅仪仗队后，便乘车前往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别墅下榻。下午6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苏方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以及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等。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便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后，又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当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毛泽东则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②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因此，“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然后，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成、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不知不觉谈了两个多小时。此间，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鉴于当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曾表示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所以，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

^①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时在车站的演说》（1949年12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②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页。

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答：“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为方便理解，翻译人员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实际内容，实实在在。然而，苏联人仍不能理解，个个目瞪口呆。斯大林继续询问，而毛泽东又不肯明说。毛泽东认为苏联较有经验，理应主动提出帮助中国，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在斯大林看来，中苏之间不论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应由他本人与毛泽东亲自签署才门当户对。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中国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① 难怪最后斯大林很不高兴地说：“这个问题（指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恩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②

第一次会晤后，毛泽东于12月18日就有关情况电告在国内的刘少奇：（一）16日与斯大林的会晤涉及和平的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等问题。（二）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雅尔塔协定的缘故，目前尚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约，会牵涉到千岛群岛问题，美国就有理由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口为苏联租借这一点，目前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项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看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

①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35—437页。

②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第160页。